

我們一代的歷史承擔

梁燕城

記得中學時在很有傳統的培英中學讀書，有好幾位資深老師，都對我說：「中國苦難重重，我們已經無能為力了，未來祖國要靠你們年青人。」中三時有一位教英文的林老師，教我讀存在主義、莎士比亞及西方哲學，他教導我認識西方文化及民主自由的價值，最後一次聊天時說：「中國必須充分現代化，才能富強。」中四時一位名鄭子新的中文老師十分愛惜我，引導我愛護中國文化，又常和我討論國家大事，最後一次見面後，我離開他家，走到街角轉彎時，他在後面高呼：「梁燕城，你要努力啊！」這些老師，深刻地塑造了我的人生。

那年代培英中學很多位偉大的老師，背負著時代的悲哀，用全心意去教育我們這班反叛青年，教我們有理想，有承擔，期盼我們能幫助中國改進。

而我的父母亦如此，從少就告訴我日本如何欺凌中國，母親說讀報知道上海淪陷，眼淚直流，本想加入空軍救國，後來考上中山大學，退到內地的坪石，在火車站認識同是到內地上大學的父親，展開一段烽火萬裡情。大學畢業後，父親到後方的車隊曾被日軍戰機掃射，在重慶又目睹大轟炸，母親到桂林尋親戚，遇到桂林大疏散，在撤退群眾中，見到親戚坐車在很遠經過，大聲叫她快走，即被人潮衝散。之後逃去廣西農村施寨，中途火車橋被炸斷，要踏鐵軌過斷橋。

戰後父母在昆明結婚，父在中央銀行工作，母在西南聯大任教，本可過美滿生活，可惜中國旋即進入內戰，49年共軍逼近昆明，在解放軍入城那天上午，父母及時買到機票逃香港。初時以為短期可回國貢獻一己學識，不料韓戰爆發，中國竹幕下垂，父母從今流落在這南方美麗的小島，失去了其救國的所有希望。

我是五十年代出生，少時見中國三年飢荒，大批飢民湧入香港，父親在這時因悲痛過度而罹精神分裂症，由母親艱苦維持家庭。初中時文革爆發，中國大劫難，浮屍飄到維港，跟著香港左派大暴動，全港動亂，上課中途政府在港島戒嚴，隨人潮逃去九龍。

我們五十後一代是在這歷史苦痛中長大的，老師叮囑要救國，父母則叫及早移民西方，大學時唐君毅老師叫我們要守護中國文化。各方面都叫我們做人要正直仁義，堂堂正正，做個有承擔的中國人。我們亦確實努力向上。

轉眼奮鬥了三十多年，自問沒有辜負上一代的期望，我全心全意研讀了民主人權思想，也投入去認識和體會中國文化。我們經歷了鄧小平改革和六四的悲劇，深思中國是一受傷的民族，93年決定不再用傷害的語言責罵中國，卻選擇進入中國服事人，在大學傳揚仁愛正義的思想，與政府



合作探討廉政的制度，又和中央政府高層討論人權改革，並上山下鄉，到貧窮人中理解需要，籌款資助優秀學生，又將民間疾苦寫成報告書，交給政府參考，改革制度。我不能幫助中國全部政治改革，但在有限力量中盡了中國人的責任，親身參與了這大時代的改進，可算一生最大之樂。